

中国经验

跨越边界的社区

项飏著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中国经验

页 卷著



郑州大学 *040102084410*

D671
X285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D671/
X285

2005/0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飏编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8
(中国经验)
ISBN 7-108-01436-X

I. 跨… II. 项… III. 北京浙江村-研究
IV. D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6045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 数 396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	1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奇怪”的社区——现代和传统——总体和具体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18
	创造中的社区——在互动中认识对方——“温州的大学生”——本书的写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45
	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两拨人——各人的年谱——住房、设备和投资——一天的生活——一天中的来客——两年以后——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91
	史前史——哥伦布的故事——来到北京——松紧两条链——一起干——摆地摊——游击战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123
	登堂入室——进攻——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执	

照—发明代销—“无本生意”—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 扩张159

皮夹克热—定销—边贸—老外进村和发包—批发点—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为什么扩散—布料市场—辅料市场—劳务市场—资金市场—“家”还是“家乡”?—改造家族—生活体系—居住格局—纠纷的解决—“打天下”—房东和房客—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 乱里挣钱294

进入大商场: 关系的艺术—大转包—小转租—营业员—“京温”故事—市场热和摊位热—新招数—办手续—保护人—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大院—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乱极了一—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帮派的形成—帮派组织—帮派和大人—联络处和联防队

第八章 1995: 波折和回潮389

建立爱心小组—“搭架子”和合同策略—对弈策略的挫折—刘家大院—风波乍起—突然的变化—自拆阶段—强行拆除—3个月以后……—大院卷土重来—新热点

第九章 讨论: 关系丛448

分离和重叠—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锁住”—关系丛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490
新空间—“套”—跨越边界的社区	
后记:理解的知识	513
参考文献	523
附件	533
致谢	562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清楚记得在 1980 年代，一位著名人士在某著名大学尝试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而告失败。他对新闻界宣称，失败的原因是“教员素质太差”。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它背后有显然的悖论。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是方案设计者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致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对那位改革者，以及大部分感叹“素质太低”的人，还是感到尊敬。他们毕竟在认真想着这个社会里的事。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并不能认为是这些悲壮的失败者“昏了头”。他们往往有成体系的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规划。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启发理性，而是过于理

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常常感到焦虑以至灰心。在成堆的问题前面,我们常常说“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但人们先要问的是,“怎么形成市场?”——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当我们从概念、从一些理论出发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感到我们是“落后”的,而且我们是偏离“正常”形态的;不是“假以时日”便可迎头赶上,而是不彻底改造自己就没有希望。

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恐怕是危险的。即使我们把它理解为“忧患意识”,但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完整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是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的。在我看来,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比较彻底地从我们的日常行为本身出发,来看我们社会中的现象。正是这种想法,激励我在当今中国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浙江村”这个“奇怪”的社区蹲了近6年的时间。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机理的惟一可靠的办法。

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讲述“浙江村”是怎么形成的。我提出,它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开发和聚合的辩证过程。“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社区,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离开了社区背后的

开放的体系，社区中的聚合行为将无法被理解。其聚合乃是为开放服务的。这和其他移民聚居区，及我们过去对移民聚居区的想像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过程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发生的呢？本书将不从结构、角色、规则这些概念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提供描写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近年来关于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但是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把中国人的关系“特例化”。特例化首先倾向于把“关系”视为是中国独有，而西方社会不太存在的东西；然后，研究兴趣往往集中在关系有哪些特别以至“奇异”的地方，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一般特征。不是在述说关系、述说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本身，而是在强调它“究竟怎么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中心论，在今天主要不表现为西方的种族中心论，或者以西方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两点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察觉，它更主要的表现是这样的取向：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的参照来看其他文化。像对关系的看法，不仅外国人这么看，中国人自己也往往跟着这么看。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可以看作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它在中国社会的范围内把“关系”作泛化并实质化的理解。似乎中国人是为关系而关系，“关系”压倒一切，成为组织社会的原则之一。第三个问题是把关系片面化。其典型

表现是把关系看作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方式等等。这一取向一方面强调关系在形式上的特殊，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它纳入西方的概念体系。我们所说的“关系”被这样一处理，就完全“跑了味”，至多只解释了它的小侧面，所以我说它“片面化”。认为关系可以简单“化约”为资本等概念，也扼杀了关系在理论上的挖掘潜力。

而在我看来，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①。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关系既是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也是对“人”本身的看法，也涉及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看法。我认为，在以西方社会理论为基本参照的取向之下，我们对“关系”所达成的了解非常有限。关键是要回到事实本身来。

人类学和社会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的。中国人在 50 个世纪的文明进程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独特的实践方式，而且形成了自己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这将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之一。和以往从西方认知里发展起来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先从中国的事实中最朴素地发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来；然后再拿这个理解去看非中国的社会，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这大概是中国学术形成自主性，并真正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的重要路子。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所持的“理论方向感”。

^① 这里特别感谢英国牛津大学彭柯博士。和他的讨论使我的这一想法更加明晰起来。

“奇怪”的社区

让我们回到事实本身。

北京“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实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地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地处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覆及 26 个自然村。本地人口（北京人）1.4 万，外来人口近 10 万^①。温州人在此租房而居，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导产业。丰台区政府在上报北京市政府的一份正式文件中开篇就说：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浙江村以其物美价廉的服装而闻名全国，更以其村容、村貌的脏、乱、差，社会治安的混乱而蜚声京城。“浙江村”已成为北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专门概念。

从天安门广场南行 5 公里，刚过南三环，你就会被甩入了拥挤的漩涡。大小汽车、三轮车、偶尔还会有老北京的驴车，团团转成一锅粥。背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从你身边匆匆走过，迎面又走来拿着大哥大急急说话的人。南腔北调，嘈杂非凡。挤在摩肩接踵的胡同里，满耳瓯语伊呀，迎面而来的尽是削瘦清矍的南国身形，真让人恍如隔世。道边摆的“水晶糕”是温州人在后村一带就地做的；“粉干”、“面干”则直接从温州捎上来。街边的“美容厅”清一色按温州风格布置。马村的菜市场里，在那些临时搭起的棚子中，及木片竹杆撑起的架子上，摆满温州人喜食的海蜇

^① 根据 1994 年 10 月有关政府部门提供的数字。此下关于“浙江村”的数字，若无特殊说明，均为本人在当地经过抽样、推论所得。

皮、虾米、蛭、鱼及桂圆、荔枝干等等。这里多数海鲜是乐清人派车从青岛、秦皇岛购进的,也有不少专门从温州本地运来。如果你是1995年以前来到这里,从木樨园把你载入“浙江村”腹地的,往往就是从温州来的那一团火红的脚踏三轮车。这一切使人感到恍然身置异域。

这里,美容美发店一家紧挨一家,装饰一家比一家豪华,但在店门口堆满的是垃圾和令人掩鼻的臭鱼烂虾;这里,政府来赶了多少次,包括1995年全国闻名的大清理,但哪次都是越赶越多,铁打的营盘来回跑的兵;这里的人们个个打扮得比北京市民要光鲜得多,住的却是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腰缠万贯的人又往往不愿意离开这里,开着奔驰、丰田在村里跑……

“这帮人怎么就能搞出这么个‘浙江村’来?”

这是北京市民、城市政府部门、甚至好多温州人自己张口就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好奇——真想知道“浙江村”是怎么来的,毋宁说是惊叹——觉得不可思议。在今天,我们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中东的海湾局势、对微软公司的产品满天飞、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对国内农民的流动……等等现象都觉得“可以理解”,认为它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免出现的事情。而“浙江村”这样的社区突然出现在首都,则难免叫人有些突兀。我在调查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话:(“浙江村”)和首都形象、和现代化大都市极不相称。不少人对我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扑到这个社区里做调查,感到不解:它难道能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什么主流方向吗?

然而,这个惊讶,却正是我做这个调查、同时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人们的“不可思议”,不仅仅是少见多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村”这个事实和我们社

会的普遍的认识模式不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

现代和传统

“浙江村”首先叫人奇怪的是:人口流动本来正是市场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但在整个地球都要被称为“村”的时候,为什么流动中还产生了“浙江村”这样落后、怎么看也不舒服的“村”呢?如果再看看“浙江村”的内部生活,这里的人们用的尽是“土”办法、“土”关系、“土”观念,他们为什么能在首都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立足并且发展呢?

自从滕尼斯提出关于 Community 和 Society 的区分(一组同义的叫法是“通体社会”和“联体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以来,人们就往往用这样的二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传统性统治”和“合法性统治”等。以及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等。刘易斯的传统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的划分,其实也可归入这一思潮。这些“对子”的提出,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传统—现代”这样的区分为基础。最典型的莫过于帕森斯提出的所谓“模式变项”。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认识模式给我们两个这样的印象:一,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坚持传统特征,那就要“失败”或陷入内心的冲突和紧张。二,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只不过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不同阶段。

这一思想被广泛地应用在人口流动的研究中。被认为最早采用实证方法的社会学研究,托马斯等人(Thomas and Zanaiecki)的《在美国的波兰农民》就体现了这个观念。对城市和移民研究有重大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强调“城市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差别。沃斯(Wirth)提出“城市性”(urbanism)的概念。帕克的继承人瑞得菲尔德(Redfield)提出的“乡土—城市”的连续统(folk - urban continuum)。他们的这一研究取向被称为Wirth - Redfield模式。在Wirth - Redfield模式之下,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Kearney, 1986)。“同化假设”也是传统—现代的思路在人口流动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它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会“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会被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Sauvy, 1966; Price, 1969: 181—182)。

关于我们的认识中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立,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已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利用率最高的靶子之一。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宣布传统和现代不对立就可以了事。我们在事实上分明感受到有一股“现代化”的趋势存在,我们分明感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过去是不一样的。Parsons等人说的理论、我们过去所形成的印象,不是全无道理的。关键是要对这个趋势中的具体过程作出分析。

在人口流动的研究中,化解现代化和传统的对立关系的具体努力,大概有这样几种:

一是我称之为的“并存”(coexisting)模式。比如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络的发现,提出“无现代化的迁移”,强调传统社会

要素和现代因素共存的可能。反驳了简单的“同化假设”。但它并没有说明“并存”的内在机理到底有哪些。

第二个重要的模式姑且称之为“依附”(dependency)与“联结”(articulation)模式。现代化理论多少抱着这样的乐观态度:人口流动将把“现代”的社会形态扩散到“落后”地区。但弗兰克(Frank, 1967)提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格局。卡斯特尔(Castell, 1975)、卡斯莱特(Caslets, 1973)、维斯特(Weist, 1979)等人认为,来自中心的生产体系的扩展破坏了边缘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组织,造成劳动力的失业;同时中心的发展又越来越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大量人口于是从边缘流向中心。这些移民不仅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并在政治上使原有的工人阶级分解,从而更有利于居于核心的资本主义部门。精壮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流出地的生产能力下降,消费人口的比例上升,于是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和发展的停滞。并且这种流动还将导致边缘地带在意识形态上对核心地区的依赖,丧失把握发展机会的意识和能力。显然,流动不可能再是一个单线的“现代化过程”。在理论上,依附论提供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统一起来考察的框架。

那么,在人口流动中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为什么能够并存?依附理论描述的中心—边缘结构究竟是怎样维持的呢?——具体说来,为什么边缘地带能持续地产生低廉的劳动力,而其价值为中心地带所攫取?梅利索克斯(Meillassoux, 1981)对在法国的非洲劳工的出色研究中指出,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由于这些地方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因而养活劳动力的费用极低。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其实也带入了大量的隐蔽价值。当这些劳动力衰老的时候,他们却又回

到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被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心地带能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又有人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移民并不进入正式的资本主义部门，而是进入所谓“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人们进而发现，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并不矛盾，相反，正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经济。后者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而消失。（Fernandez - Kelly, 1983）这些研究指出了人口流动把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传统小农）“联结”起来。在联结模式下，出现了一批对“大体系下的小社会”、“跨越两个世界的家庭和和社区”的研究。一方面是联结，一方面是对以往所形成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我把“浙江村”叫做“跨越边界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联结模式的研究思想。

但是依附和联结理论解决的事实上是“传统地区”和“现代地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讲到行为规则的层次上。迁移研究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模式就更深了一层。

嵌入理论虽然是经济社会学中一个普遍的理论话题，但关于移民和种群（ethnicity）的研究是它最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Merton, 1993）

嵌入性的基本意思是强调经济的交易行为是被置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这将影响交易的方式和结果。波拉尼（Polanyi）最早提出这个想法。他要强调的是，市场不是“古已有之”的自然之物，过去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到别的社会关系中的。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提出，不仅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被一定的社会结构所塑造，到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如此。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想像的那样，经济活动将从其他的或者说一般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Granovetter 十分突出网络

的作用。移民经济所以能以“非现代”的手段在现代经济中存活,并且颇有活力,就是因为它的经济能更好地扎根于一定的网络之中。

但是嵌入性理论有一个问题:它要说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一,它讲不清楚“嵌入”本身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这一理论十分强调信任的重要,认为不应该把信任归结为制度或者是“普遍道德”的威力。但是它仍然不能回答:人为什么会信任某个人?或者讲得更明白一点,网络为什么会促使人们更好地信任?波尔兹(Portes, 1993)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强制的信任(enforceable trust)。它强调在紧密团结的团体中,人们会把集体的规则置于个人的眼前利益之上。这样比起一般市场条件下的交易行为就多了一种监督力量,于是互相间的信任也就更加牢靠。为什么能够这样呢?Portes(1993:1325)指出两点理由。一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会带来长远的利益,人们“知道”集体对个人的制约将带来好处。更重要的理由是:如果你做了集体期望之外的事情,你将被“驱逐”。(Granovetter也提到这个“驱逐法”的问题。)这两点解释说的恐怕都不是事实本身的逻辑。第一点说的是,一个人因为知道怎么做是合理的,于是他这么做,这等于是什么都没做。至于用“驱逐”解释信任就更是同义反复,甚至是循环论证,——在一个集体中,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发生在前呢,还是集体的共同意志产生在前?

其实很显然,一个稳定的网络必然产生于信任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网络就等于信任。不能用网络来解释信任。

第二个问题是,嵌入理论未能说明在“嵌入”的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是怎么发生、怎么变化的,和我们过去理解的有哪些不一样?Granovetter消解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之